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与中苏友好

□ 左凤荣

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一边倒”就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战略选择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世界已经形成美苏两大对抗阵营的形势所决定的，新中国只能倒向苏联一边。毛泽东访问苏联，与苏联结成同盟，是“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实践。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苏联需要确定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关系。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直到2月8日才回国。米高扬自称主要是来听取中共方面介绍情况的，实际上是来摸底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与米高扬多次举行会谈，使其了解了人民军队不急于占领大城市的原因和共产党员中无产阶级成分少的问题，也表达了要向苏共学习和坚定站在苏联一边的决心，打消苏共的疑虑。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6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得到了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苏方表示要全面帮助中国。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提出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强调，“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国访问。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岁生日，专列拉了江西蜜橘、山东大葱等特产，作为生日

贺礼。12月16日，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大钟刚敲过12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便停在了莫斯科这个著名的火车站。因天气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毛泽东被苏方安排住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当晚，斯大林便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毛泽东一行，中苏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可见苏共对新中国领导人访苏的重视。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重要目的是废除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的条约。该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将于8月8日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中苏需要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6月27日，蒋介石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蒋经国前往苏联谈判。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斯大林想得到比《雅尔塔协定》更优惠的条件，双方在大连港、旅顺军事基地、中长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当时中国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改变斯大林的立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中苏签订了条约，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斯大林实现了使外蒙古独立的愿望，恢复了原来沙俄在中国的租界地和铁路使用权，期限为30年。

新中国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自然需要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在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约的问题上，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斯大林不想废除旧

约。12月24日，中苏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谈前，毛泽东请苏方人员转告斯大林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但在会谈时，斯大林只字不提。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滞留莫斯科，闭门不出，也不参加苏方安排的活动。外界传闻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斯大林无奈，只能改变态度。为消除外界谣言，毛泽东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在回答将在苏联待多久的问题时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同一天，苏方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约，周恩来来莫斯科商谈此事。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正式谈判中，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苏方对其在旧约中所获得的利益，并不愿作出让步。由于外蒙古问题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已经解决，此次中苏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二是关于苏军驻扎旅顺港和大连行政管理权的问题，三是关于东北和新疆“势力范围”问题。经过反复磋商，在中长铁路、旅顺、大连这些核心问题上，苏方基本采纳了中方提出的方案。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在克里姆林宫签订，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签约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正式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并没有加入经互会，也没有参加后来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

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成就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新条约明确规定中苏加强友好与合作，“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还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苏联保证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方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方完全彻底收回了主权。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达到了与苏联重订条约的目的，这对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80年2月14日，该条约到期，中方宣布不再续约，开始了不结盟外交。

新中国外交



衣被天下 ——棉花何以改变中国

□ 李轻尘



一位女性和一个产业

1245年，一个叫黄小姑的女孩降生在南宋的松江府。随着父母的离世，为了生存，年幼的黄小姑只好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黄小姑每日受尽夫家折磨，直到她逃到码头，把命运交给一艘不知终点的船，而这艘船驶到了崖州。崖州是黄小姑的重生之地，住在黎寨后，她学习了黎族独特的纺织技法，不久之后，便以擅长织布、改造工艺而远近驰名，崖州也成为她一生辉煌事业的起点。

这位黄小姑就是黄道婆。

实际上，这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其真实性已不可考。但是黄道婆高超的纺织技术是有史料记载的。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信并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她创造了一个传奇，她将手工棉纺织技术带回中原，掀起了中国的“棉花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纺织业进步。

黄道婆这位伟大女性的不凡经历，已经被编织成许多让人津津乐道 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记得中国高超的棉纺织业，曾被一双女性的手点化过。棉花和女人之间似乎在冥冥之中就有着很深的关联，比如很少有经济作物用“花”来命名，并在生命前期被当成花来养；“棉”这个字也带着女性的柔婉，洁白的棉桃给人一种纯净而温暖的力量，几千年来为人们提供厚重的关怀。

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里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主导的许多家庭中，妇女除了承担日常的农业劳作外，以纺织补贴家用在一些地区也是常态。那么，棉花为何如此重要？

想象一个没有棉花的世界

人们总说“衣食住行”，可见日常生活中衣服的重要性，人类不像动物有皮毛蔽体，只能利用衣物保温和防晒。棉花能御寒似乎是古代各地区人们不约而同的发现，当然人们也尝试过用动物绒毛、稻草等物填充，但是要么无法普及，要么保暖性能很差。

在十几万年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智人从非洲稀树草原迁移到气候更为寒冷的地区，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环境考虑。最初人类主要使用动物毛皮抵御风霜，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农业社会逐渐形成，农业、畜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类开始试验用不同的纤维去纺纱和织布，发明了各式将植物转化为布的方法。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的农民和工匠不仅使用苧麻纤维，还发现了丝绸，但丝绸产量相对较少，价格也比较高昂，只有富人穿得起。一般百姓的制衣材料多是麻、葛，手感相对粗糙，保暖效果也差些。因此，穿这类材质衣服的人又被称为布衣百姓，“布衣”并不是指穿棉布衣服的人。在宋、元以前，棉布在中国还没有普及。

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发现了最早的棉纺织品残片，形成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250年至

公元前2750年间。在丝绸、皮毛、亚麻、棉花组成的纺织世界里，棉花的重要性逐渐提升。今天的我们可能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棉花的世界了，如果没有棉花，生硬的亚麻被子可能会在某日清晨挫伤你的心情，手洗一件沾了污渍的毛皮大衣会把你累到半死，或只能望着奢侈品店的高档丝绸不停感叹。

除了制衣，棉花还是制造纸币、肥皂、植物油以及无烟火药的材料之一，时至今日，棉花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代以石油为原料的廉价化学纤维曾对棉花产生过冲击，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已经意识到自然纤维很难仿造，棉花依旧无法替代。

棉花在中国

人类使用棉花作为制衣原料，已经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而在中国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种植的棉花居然大多是用观赏的。一位来自阿拉伯的旅行家，在书里描述了他在中国的“神奇”经历。公元851年，一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人游历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发现人们的花园里种植的棉花，只是作为花卉来观赏，他大为不解。棉花在阿拉伯地区是实用的经济作物，在这里却是一种除了观赏没什么用处的“花”，可见当时棉花的实用价值在中国还未普及。

实际上，棉花并不是中国本地作物，而是最早从印度传入的。印度的阿萨姆邦是木本亚洲棉的发源地，在印度次大陆也发现了较早的棉花纤维纺线。亚洲棉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条路是经东南亚至我国的海南岛和两广地区，黄道婆居住过的崖州就一直保有种植棉花的传统；另一条路是从印度到缅甸再传入云南。

在秦汉时期，海南岛已经开始种植

棉花以及生产棉布，尽管中国使用棉花的历史很早，但由于棉花对生长环境有一定要求，先是在海南岛、新疆等边地驻留了很久，直到宋元时期才逐渐传播到中原内地。中原最早的棉纺织品被认为是来自一个南宋古墓中发现的棉线毯，从那时起棉布逐渐替代了其他纤维制品，成为百姓制衣的主要材料。

元朝的棉花种植在中国农村地区已经较为普遍，在事实上取代了苧麻等纤维原料。元初，政府设置了木棉提举司，向民间每年征收大量棉布物资，对于劝民种棉一事不遗余力。棉花能为军队提供棉衣，可抵税赋，在朝廷号召下百姓也热衷种植。

棉花产业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离不开明朝初年的强制推广，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浚说，棉花“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明朝末年，全国棉纺织业很发达，各地有不少中小作坊。

到了清朝，棉布更为普及，老百姓几乎都穿棉布衣服。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扩大到了4亿，棉花产业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世界棉花产业主要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直到18世纪末，这两个地区产出的原棉和棉纺织品数量还远远大于欧洲和美洲。但不久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蔓延，欧洲资本家以惊人的速度改良技术、占据市场，中国的棉花产业也被资本主义打造的棉花帝国裹挟。

受洋布、洋纱传入的影响，中国大量的棉纺织工人失业、破产，“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1878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也在任职湖广总督期间，把他在广东创办的纺织厂搬到湖北，筹办了湖北纺织四局。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产业自强的序幕。

为了帮助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移居香港的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一）

“保盟”宣布了两项奋斗目标：一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是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从成立至1945年12月迁至上海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之前，分为以香港为中心和以重庆为中心的两个阶段，在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香港、重庆等办事处的关怀下开展斗争。日军侵入香港后，“保盟”领导成员1人牺牲，3人被关押，9人被迫隐蔽。“保盟”没有被法西斯敌人吓倒，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把总部迁到重庆继续英勇战斗。

“保盟”努力发展与健全组织，增强与壮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宋庆龄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重，不仅动员和争取到与她政见不同的亲友故旧、国民党的爱国有识之士及其夫人和子女，还邀请到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包括香港总督罗富国夫妇，参与或支持“保盟”工作。“保盟”的领导机构是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宋庆龄还邀请了一些国际友人在领导机构任职，如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担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法朗士担任名誉司库。反法西斯活动不断深入，“保盟”中央委员会又下设财政、运送、宣传出版、促进4个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分别是法朗士、贝克隆、邹韬奋（克拉克任秘书）、玛丽恩·苔德莉。他们大多数是外国人，便于获取国际支持和开展活动。“保盟”还设立了上海和广州分会。广州分会设立不到一个月，因广州沦陷而停止工作。上海分会于1938年冬秘密成立，由美国人耿丽淑女士担任秘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卓有成效地支援了新四军抗战和其他反法西斯斗争。分会的中国成员有的被国民党关押，有的被日伪特务暗杀。

（二）

“保盟”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是通过国际宣传，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捐助；二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将急需战备物资送往抗战前线。

加强国际宣传，赢得国际社会捐献。宋庆龄认识到要赢得海外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就必须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国民党对敌后战场的歪曲宣传，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前线的实情、真相和迫切需求。“保盟”主要从两个途径加强国际宣传。一是宋庆龄凭借一定的国际声望、特有的身份地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时机。她主动到香港和重庆广播电台进行国际演讲，多次写信给外国民间团体和救济组织，积极主动地出席国际性会议并演讲，1940年发表圣诞致辞，在海外华侨办的报纸上多次发表文章等，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国际宣传和舆论斗争。二是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简称《通讯》）等20余种宣传品向海外发行。《通讯》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刊物，从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铅印英文版正式出版36期，主要由贝特兰和爱泼斯坦等人编辑，主供外国机构和保盟支部。由于报道内容的真实、及时、全面，广受国外援华机构和海外华侨的青睐。创刊前4个月，发行量就由1000份增加到2500份。从1941年初至12月总部撤离香港前，《通讯》出版中文版，主供海外华侨社团。

国际宣传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方面。一是指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意义。宋庆龄指出，“中国人民是与威胁全世界的战争搏斗”，“是去制止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暴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二战爆发后，宋庆龄指出，中国“远东前线仍然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的地区，而且

『保卫中国同盟』的反法西斯斗争

□ 孙玉华

将被证明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地区”。这让国际社会明确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意义，呼吁、鼓动国外团体继续支援中国。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后勤保障困难。这是国际宣传的重点内容。“保盟”向国际社会介绍了前线战场急需的物资，如食品、药物、医疗设备、冬衣、被褥、毛毯等。“保盟”获取上述信息的渠道是：派成员或者观察员实地考察、共产党领导人主动提供、共产党派敌后战场将领直接到“保盟”总部或分部求援。三是在《通讯》登载“保盟”收到的国际捐款、物资数目及捐助者名单。“保盟”仅在香港期间，不仅收到国际社会大量的捐款，包括国币（即法币）、港币、美元、英镑、加拿大元、比索、西班牙比塞塔、荷兰盾等多个币种，还收到大量各种急需救济的物资。“保盟”的宣传成就，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援，也展现了“保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艰辛成果。

“保盟”还千方百计将国际援助送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保盟”在向国际社会募捐的同时，也在香港、上海和重庆举行过多次募捐活动。他们收到国际捐助后，认真记录在册，严格管理。宋庆龄在每一笔捐款收据上都签名。根据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迫切需要，绝大部分捐款用来购买战场上的急需救济物资。虽然日军切断了广九铁路和中国与越南的交通线，国民党也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地进行封锁，但是“保盟”千方百计、克服 困难将国际援助送往敌后战场。宋庆龄亲自过问物资运送工作。很多物资是由“保盟”的外国人和国际友人护送，如国际友人帮助邮递、美军飞机空运、交给国际医疗队携带等；有时候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或设法转交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转运，但也曾被国民党方面截留过。有些物资上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确保安全到达。“保盟”的捐助活动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破坏。“保盟”捐建的国际和平医院医疗网，解决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缺医少药的严重困难，也输送了一大批医生。

“保盟”团结了世界上大量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筑起了桥梁”，为世界和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